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培育)项目(11JBGP050)
山东大学、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资助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lk Culture 2014**

中国民俗文化 发展报告 2014

张士闪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培育)项目(11JBG050)
山东大学、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资助



**Report on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lk Culture 2014**

中国民俗文化 发展报告 2014

张士闪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 2014/张士闪主编.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07-5454-3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风俗习惯—研究报告—
中国—2014 IV. ①K8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7953 号

责任编辑:陈海军

封面设计:张 荔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2.25 印张 409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0.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 2014》 编委会

主 任：

李 松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

委 员：

李文亮 国务院参事室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副主任

赵世瑜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铁梁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 刚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副主任

刘德龙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

周 星 日本爱知大学教授

目 录

总报告	(1)
2013 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总报告	(3)
一、2013:多主体的民俗运用与中国社会发展	(4)
二、2013 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考察的七个发现	(13)
三、2013 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五项建议	(15)
分题报告	(17)
2013 年度中国民俗文化研究综述	(19)
一、理论探讨	(19)
二、田野研究	(26)
三、民俗文化发展策略	(34)
2013 年度国家治理下的城乡民俗文化发展动态	(50)
一、近现代以来国家治理下的城乡民俗变迁	(51)
二、2013 年度国家治理下的农村民俗文化发展	(60)
三、2013 年度国家治理下的城市民俗文化发展	(75)
四、2013 年度国家治理下城乡民俗文化发展的特征及建议	(85)
城乡关系视野中的中国民俗传统与当代发展	(90)
一、社会建构:中国民俗学研究的三个阶段与地方价值确认	(90)
二、“村落中心”的民俗学传统及其向城乡关系的开放	(96)
三、1949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城乡关系与村落民俗的 “迷信”化	(103)
四、新时期 30 年:城乡关系的发展与“伪民俗”	(108)
五、2013 年度城乡关系视野中的民俗发展焦点:乡愁	(114)
专题报告	(121)
传统节日的调查研究和现代治理:2013	(123)
一、百年来的节日调查(1910~2014)	(124)
二、现代治理视角下的传统节日发展	(131)

三、推进传统节日研究向纵深发展	(141)
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143)
2013 年度中国婚俗研究报告	(144)
一、当前中国婚俗变迁考察	(145)
二、中国婚俗变迁的动力与机制	(174)
2013 年度中国葬俗研究报告	(178)
一、宗族型村庄的葬俗活动	(181)
二、原子化村庄的葬俗活动	(196)
三、小亲族型村庄的葬俗活动	(199)
四、一些讨论	(205)
2013 年度中国网络谣言与民间话语研究报告	(212)
一、网络谣言的特点	(212)
二、警惕和制约谣言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214)
三、“两高”《解释》对于网络谣言的司法解释	(216)
四、公安部集中打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	(217)
五、热点谣言分类	(243)
2013 年度中国民间信仰研究报告	(284)
一、2013 年度民间信仰发展动态综述	(284)
二、2013 年度民间信仰研究的学术动向	(296)
三、重点话题与相关讨论	(316)
2013 年度中国民俗旅游研究报告	(326)
一、我国民俗旅游发展概况	(326)
二、2013 年度中国民俗旅游发展的背景分析	(328)
三、2013 年度中国民俗旅游发展综述	(330)
四、2014 年度中国民俗旅游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336)
五、2013 年度中国民俗旅游十大热点话题	(339)



总报告



2013 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总报告

张士闪 李海云*

在全球一体化进程加速、地缘政治波诡云谲的当今世界,立足本土传统,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华崛起的必然选择。凭借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积累,近年来,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的政治改革波澜骤起,并持续地向社会生活落实,已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以此为背景,文化的引领作用就必然会得以凸显,传统的智慧也将受到空前地重视。2013 年我国“民俗热”趋于深化,并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发展进程,自在情理之中。2013 年的民俗文化发展,其主要特征是国家治理下社会多阶层的民俗运用。这一主要特征的显现,既是中华民族国家治理传统的借鉴与延续,又以当代社会语境中国家、知识分子与民众的自觉活用而别具意味。因此,2013 年中国民俗文化的年度发展态势,既需要对“礼俗互动”的中国社会的传统特色予以追溯,又需要在当代社会的总体发展中考察,重点关注民俗传统在国家整体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多社会阶层与“民俗”相关的生活建构与文化创造。

综观一部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史,可以发现,国家意识形态的提倡和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与宏观管理,很大程度上要在向民间社会生活的贯彻中才能真正得到落实,即“顶层”向“基层”落实、“基层”又涵化“顶层”的必然逻辑。国家治理与民俗传统有着深刻的互补互益关系,两者密切的互动协作是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基于此,本年度报告的撰写在沿袭已有模式的“三个注重”^①的基础上,将“多主体的民俗运用”作为 2013 年度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的界别特征,以此为线索发现问题,建言献策。

* 张士闪,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海云,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民俗学研究所博士生。

① “三个注重”包括:一是注重考察年度民俗活动的现场性与创生性特征;二是注重把握年度民俗活动的“节点”事件,通过对“节点”事件的深入阐释,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呈现年度民俗文化发展的内在“纹理”与发展“脉络”;三是注重树立“大民俗”观念,不仅考察年度民俗发展中传统民俗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创生以及现代性活动中的新生民俗,更要关注民俗传统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宏大格局中的“再嵌入”问题。

一、2013:多主体的民俗运用与中国社会发展

(一)国家主流话语中的民俗运用

在我国,民俗政策自古以来就与国家善治传统联系在一起,官方与民间的“礼俗互动”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越到后来越受重视。这从中国历代对“民俗”“风俗”“习俗”等语词的使用中,可以直观地感受到。“风俗”一词因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色彩,在传统社会中使用最频繁。^①不过在进入民国以后,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民主思想影响,特别是西方现代民俗学“folklore”一词翻译后的巨大影响,“民俗”一词的地位逐渐上升,而“风俗”一词的地位则有所沉降,其原有的教化之意逐渐淡化。综观整个20世纪,中国社会的“民俗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于民俗的认知大致经历了“应铲除的封建迷信”——“应区别对待的民间文化”——“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转变。与此相对应的是,民俗学科在现代学术版图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并被赋予理解国情和济世致用的社会责任。这一趋势,在2013年国家政治与民俗学术的密切互动中有明显表现,并以现代国家治理向民俗传统的自觉贴近为显著特征。

2013年,是国家政治改革有选择地向社会生活层面落实的一年,传统文化以其寓含历史智慧、联通民心、蕴具国际影响力的特质,受到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大受重视,其实质是利用传统智慧推进国家社会建设,而作为群体生活规范与文化认同的民俗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几乎是无可取代的。在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和中央文件的主流话语中,大量运用民俗语词,多处涉及民俗范畴,也就并非偶然。

1.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

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中指出,教育实践活动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以“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为总要求。照镜子,主要是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正衣冠,主要是按照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勇于正视缺点和

^① 相关表述如:“故君民者,彰好以示民俗”(《礼记·缁衣》),“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等。传统社会中与“风俗”相关的政治意识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风俗被视为时政的镜鉴,对巩固国家政权有重要价值;第二,风俗包含教化含义,与国家政治对于社会治理的目标是一致的。相形之下,“习俗”“民俗”的表述主要是指称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民间生活现象,其所具有的“载舟”“覆舟”力量虽也时或被意识到,但更多时候是强调其与上层文化相对的“下层”性质。

不足,严明党的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敢于触及思想,正视矛盾和问题,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端正行为,自觉把党性修养正一正,把党员义务理一理,把党纪国法紧一紧,保持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洗洗澡,主要是以整风的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深入分析发生问题的原因,清洗思想和行为上的灰尘,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治治病,主要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区别情况,对症下药,对作风方面存在问题的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提醒,对问题严重的进行查处,对不正之风和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

“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本为日常生活用语,此时作为治党制度的形象化说法,通俗易懂,极具张力。显然,共产党的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作为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的保障而展开的,可以引导和促进广大党员干部端正思想、增强党性、表里如一、改进作风、提高本领。这一要求既然是面向全党而提出的,非通俗易懂不具感染力,不深蕴张力不能鞭辟入里。这一看似寻常的治党要求,在随后的工作中得到了严格落实,成为国家政治改革向社会生活层面深度落实的年度亮点。

2. “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2013年12月12~13日,中央召开了城镇化工作会议,讨论《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城镇建设,要实事求是地确定城市定位、科学规划和务实行动,避免走弯路;要依托现有山水脉络等独特风光,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要融入现代元素,更要保护和弘扬优秀文化,延续城市历史文脉;要融入让群众生活更舒适的理念,体现在每一个细节中。”这段表述感性而诗意,与传统的官方语体颇有差异,一出台即引起诸多观察人士的关注,也触动了众多知识分子对于近年来趋于凋敝的农耕文明的乡土情结。察其前后语境,“乡愁”出现在对生态文明的提倡中,并与生态文明的人文价值指向合拍,也包含了对中国城乡关系的一种定位。

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新一届中央政府大力推行的主体改革内容,其核心乃是人的城镇化,其目标在于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通过深入的地权改革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引导中国“农民”向“市民”转变,最终使中国农民在地权流转中虽然去家离土,但在合法权益获得保障的前提下,仍能获得稳定的立身资本与身份认同,唯有如此,才能使其在未来的生存竞争中保持资源,维持其生存尊严。唯有保障农民这份生存尊严,才能唤起其“地方”认同的价值升华,由此价值升华作引导,才能使这些在新型城镇化中离土离乡的农民,在对故乡的回头一望中产生“乡愁”体验。中央新型城镇化决策中提出“乡愁”,旨在强调自然山水和民俗传统应该成为城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地方认同和文化意象。可以说,中央决策文件提及“乡愁”本身,就是在当今已成汹涌之势的城镇化建设大潮中,及时投放的一味

祛火猛剂,是对正在走进城镇化生活中的人的情感价值的凸现,是对“人的城镇化”战略的细化。“乡愁”这样的字眼出现在政府会议公报中,表明国家已在政策层面上将人的情感需求和满足纳入到城镇化建设的任务和目标之中,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决心下大力气扭转“物的城镇化”而建设“人的城镇化”的恰当体现。

3. “严禁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

2013年9月3日,中共中央纪委和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提倡“过一个风清气正的中秋节、国庆节”,明确要求“节日期间,严禁用公款送月饼送节礼;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严禁用公款安排旅游、健身和高消费娱乐活动;严禁以各种名义突击花钱和滥发津贴、补贴、奖金、实物”。

10月31日,中共中央纪委又发出《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针对“每逢元旦、春节,一些地方和单位用公款大量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印制越来越奢华、浪费越来越严重”的现象,明确要求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金融机构“严禁用公款购买、印制、邮寄、赠送贺年卡、明信片、年历等物品”。

迎来送往、亲朋欢聚、礼尚往来本是传统节日期间的一种常态,但一段时期以来,这种情感表达和象征性的交往方式却演变成为权钱交易的官场潜规则,天价月饼、金质贺卡、饕餮盛宴便是其中的极端表现。中共中央在颁布上述两个文件的同时,也敦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强化监督检查,对顶风违纪的当即查处,严肃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并对典型案例予以通报曝光,这使得一段时期以来在节日期间近乎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腐败、奢侈行为得到有效的遏制。与此同时,国家逐渐增强服务民众、改善民生的职能,支持民众对传统节日的自觉传承与主动创造。

这两个文件出台的背后,是国家政府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认知不断深化的结果与对传统节日中某些异化倾向的明确矫正。国家整顿、规范与民众生活密切的节日活动,从细处遏制节日不良社会风气,还原节日本身所承担的情感表达、心灵抚慰以及公共性意义,这对国家政治改革来说具有治根治本的意义。

4. “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

2014年2月24日,还没出农历正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行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

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要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其中提到的当代行业规章制度、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群体规范,与中国传统的民俗规约一脉相承。民俗规约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形式,历史上国家意识形态的提倡,在很大程度上要在向民间社会生活的贯彻中才能真正得到落实。民俗规约既是以传统文化为制度基础而制定,它所承载的就必然是传统社会与文化所要求的规范和秩序,最切近中华民族的生活世界,古往今来滋养着千万民众的生命情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生活实践中,一直有着一种礼俗互动的流畅渠道,官民之间良好而合理的政治互动框架由此奠定。它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至今绵延不断的有力保障,也是这个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基石。如今,国家借助这类“新旧杂陈”的民俗文化形式,可以便捷地促进民族国家的新型构建,助推社会转型、社会团结与文化创新发展。而借助国家主流话语,民俗规约对于当代社会的影响,也将从传统意义上的民间社会层面,扩展到对现代生活世界的主体构建层面。

5. 说不尽的“中国梦”

“中国梦”是习近平在 2012 年 11 月 29 日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正式提出的,2013 年又在多个场合中被深度阐释。3 月 17 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反映了我们先人们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3 月 19 日,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夙愿……中国人民发自内心地拥护实现中国梦,因为中国梦首先是 13 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3 月 23 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做梦”“说梦”“圆梦”本是典型的日常话语,属于民俗学研究的常规范畴。不难发现,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系列阐述,是将中华民族复兴等宏大理想与执政理念浓缩为“中国梦”,并与民众自身的“生活梦”相契合,从而将中华民族的“大我”与身为中国人的每一个“小我”紧密联系起来;国家最高领导人通过不断地言说,使其充分释放出凝聚人心、稳定社会、聚焦目标、显示文化自信等意义,尤其是在更广泛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层面,成为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的重要理论支撑。

(二) 知识分子对传统民俗智慧的挖掘提炼与济世致用

新世纪以来,民俗学研究中传统的精英主义立场被抛弃,眼光向下关注民众当下生活成为主流,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民生关怀与整体社会发展的和谐同步。从研究方法上来说,民俗学者通过对“不见人”的传统民俗学的深刻反思,扬弃从广泛民俗生活中抽离某种“民族文化”的传统做法,代之以与民众自由平等的对话立场,体现出对民众个体生活及文化创造的充分尊重;同时,以体贴入微的方式对社会转型中的民生状况予以关怀,积极参与到理想社会的构想和实现中。总的说来,拓展民俗学研究疆域,以民俗为方法而不是囿于“民俗”,以关注、理解、阐释民众生活世界的方式推进当代社会的公平、和谐地发展,业已成为民俗学界共识。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民俗学者努力通过对社会公共文化建设的深切参与,展现民俗学的参政优势,同时也提升自身的资政能力。以此为背景,民俗学科在现代学术版图中的地位呈上升趋势,并主动承担起理解国情和济世致用的社会责任,这在2013年国家政治与民俗学术的密切互动中有明显表现。

其一,2013年,诸多民俗学界论坛、研讨会呈现出鲜明的济世致用色彩。2013年8月20~23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山东省莱芜市政府在传统的中元节期间举办“乡土传统与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立足当下新型城镇化建设实际,总结、审视、剖析城乡社会结构的内涵与外延,讨论国家政策对乡土社会的现实影响,探索行政力量与学术主体实践的互动影响和价值意义。9月3日,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举办“规范节庆活动管理研讨会”,邀集多位民俗学者对《节庆活动管理办法(试行)》(中办发[2012]18号)进行研讨,为新形势下提高节庆活动管理的科学性献计献策。10月11~13日,山东省民俗学会举办“城镇化进程中的鲁南民俗保护与传承”,以地域文化为基点,探讨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保护与传承的多种路径。10月13~14日,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办“当代社会中的传统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以传统生活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传承与嬗变为背景,广泛探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统生活”“当代生活中的传统因素”“民间信仰与文化遗产的关系”等专题。10月25~28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联合主办“艺术人类学与文化遗产研究暨2013年中国艺术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会议设定的议题为“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艺术人类学视野下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发展研究”等。10月31~11月3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举办“全国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福建)高峰论坛”,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探讨中国古村落保护和利用,介绍和推广各地古村落保护经验,进一步促进各地古村落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发展工作。11月8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主办“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的中国实践:创新与问题”研讨会,聚焦“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研讨“非遗”保护中的有效性与可能性、主体性、本真性、文化本质主义、公益性保护、新文化霸权等现实问题。12月30日,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第四届春节文化论坛,以“中国年·中国梦”为主题,探索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春节文化传承和新型春节文化的构建。2014年1月12日,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办“乡愁中国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论坛”,就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乡愁”的概念内涵及发生机制,新型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发展出路、城乡关系建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学者的责任与使命等问题进行研讨。

其二,民俗学者自觉强调民俗学术的社会服务功能,使民俗研究从职业化的学术活动转化为理解当代中国的一种立场与角度,以及从学术本位出发的咨政应询功能。其中,以三种向度的研究较具代表性。第一种以高丙中、吕微、户晓辉为代表,首先以哲学思辨的方式,论证当代中国的“民俗复兴”在实践上的合法性和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由运用民俗的正当性,然后从实践理性的立场,强调民俗作为人们共时性地享用的生活文化和文化生活,通过对“民如何是自由的人”“文化如何是人的自由的创造”的思考,尊重并维护不同的民族、个人的文化权利,推动中国民俗学进入主流学术和主流社会话语,并为国家的文化建设、理想社会的构建以及民生幸福作出更大的贡献,以此回应“我们自己的社会向民俗学界提出的重大知识需求”。^①第二种以董晓萍为代表,从民俗学视角展开的对于“国家文化建设”的宏观设计与论证。她将国家文化建设问题进行分类,包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具有多元文化来源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和遗产文化,认为民俗学对国家文化建设提出可参与解决的关键问题主要有:“政府主导的社会主义文化运行与民俗文化良性运行的整体关系,国家公共文化政策与投入民俗文化服务的协调关系,政府文化工作进入联合国人类遗产保护框架后对维护原地文化权利和改善原地人民生活的关系,我国对外文化输出中的民俗代表作的成本与收益,以及在世界灾害一体化的变迁趋势中,对优秀民俗在综合防灾减灾工作体系中发挥文化作用的评估,等等。”^②基于此,她从民俗学角度展开的对于国家文化建设的研究,广泛涉及到国家文化权利、文化多样性等问题,应是新时期民俗学研究的大方向。第三种以张士闪承担的教育部项目“中国民俗文化发展年度报告”编撰团队为代表,包括李松、刘铁梁、王学文、耿波等,认为随着中国社会化程度日益成熟,国民社会契约意识日渐浓厚,民俗文化发展策略正成为中国现

^① 吕微:《民俗复兴与公民社会相联结的可能性——古典理想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民俗研究》2013年第3期。

^② 董晓萍:《新时期民俗学研究与国家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朝戈金、董晓萍、萧放主编:《民俗学与新时期国家文化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代化进程中诸多问题与矛盾的解决之道,因此,当代民俗学者不仅要关注当代中国社会中由形形色色民俗事象所构成的人文传统,对乡土民俗关键要素的变化予以忠实记录,还应记录中国民俗文化发展的前沿趋向,剖析中国社会发展的民俗文化趋势,突入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场域,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民俗文化层面的应对策略。李松曾尖锐地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弱化、疏离与解构现象,本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但我们在农村发展中考虑更多的理念仍然是路路通、数字化、GDP等,这是一种被偏颇的政绩观所绑架的发展理念,而学术界也大有值得检讨的地方,“学人缺乏对乡村社会的长期的服务意识,而且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上解构的多,就是品头论足的多,建构的少,而真正能帮上忙的就更少”^①。由众多民俗学者合力完成的两卷《中国民俗文化发展年度报告》^②,便是围绕中国民俗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开展的对策性、前瞻性研究。其中的专题报告都是对于田野调查、社会调研、舆论分析等方法的综合运用中形成的,受到国家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如《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工作亟待加强》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每日汇报》收录,《转变民俗旅游发展思路,构建旅游服务社会模式》刊载于国务院参事室《国是咨询》,显示出民俗学术在观察、解决现实问题中的特别优势。

其三,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受到民俗学者的普遍重视。如丁慰南认为,随着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过渡,在先进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代表先进思维观念的民俗文化,对经济发展、物质生产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现代民俗文化社会功能最突出的表现,民俗学者应进一步认识和研究现代民俗文化的特征及社会功能,以服务于当代社会发展。^③李跃花关注民俗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和价值,认为民俗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产物,具有促进自我身心和谐、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培育国家意识、增进族群内部团结等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价值。^④杨庆黎认为民俗所特具的心理调节作用,诸如个人情感宣泄、满足人的亲和需求、满足人的安全需求等,在处于转型期的当代社会具有特殊意义。^⑤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表现,但与此相关的环境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何和谐发展、持续发展已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

① 李松:《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保护与变迁》,《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

② 张士闪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2》,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张士闪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3》,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③ 丁慰南:《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与社会现代化新潮流》,《新经济》2013年第20期。

④ 李跃花:《乡风民俗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价值研究》,《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⑤ 杨庆黎:《论民俗文化对心理的调节作用》,《保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重要问题。江帆、詹娜提出应对各民族文化传统及价值观进行反思,在生态文明的视域下来转换和重构民俗价值观,倡行生态环保的“绿色”民俗,唤起民众的生态危机意识,以实现各民族的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实现“诗意地栖居”等等,也颇具新意。^①

(三)社会催生与主体建构的“城乡民俗连续体”

国家治理与民俗文化发展是一种共生关系,在我国是一个长期互动的过程。民俗文化由民间自发形成,具有多样性、地方化特征,而国家治理则属于顶层设计与宏观管理,具有统一性、标准化的特征。民俗文化总是想寻找自由发展的空间,而国家治理的方针与策略则是将民俗文化发展控制在既定的轨道中,因此国家治理的规约性与民俗文化的自发性之间存在张力,须经过双方不断地调适才能逐渐融合。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国家社会治理又是以丰富的民俗文化实践为支撑的,离开了民众生活的认同与贯彻,国家社会治理便无从谈起。同时,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结构存在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于所处社会的更大的结构之中,必然会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外力”的影响,这种“外力”以国家政治的力量最为强大与持久。即使是看似自由发展的民俗文化活动,实际上依然摆脱不了国家宏观政策和社会发展现实的影响。

总的说来,在国家政治改革持续向社会生活落实的过程中,民俗文化便会作出主动或被动的反应,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影响涵化到自身发展脉络中,在尽量保持传统框架与民间特色的同时,彰显出时代政治的特有气息。当然,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变迁的发生,最终是通过民众的行动实践和心理变化来实现的。

2013年,在中央新型城镇化决策的继续推动下,城市与乡村的民俗文化始终处于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城乡民俗文化发展中有着一一定的趋同现象,反映出城乡民众在日益交织的现实境遇中,互为借鉴,互为资源,在主动建构自身生活世界过程中的相通相连。

1. 国家治理中的村落民俗传统发展

在国家政治改革持续向社会生活落实的过程中,乡土村落的民俗文化发展呈现出两大特点:

一是乡村在国家自上而下的治理中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结果既不是村落的终结,也不仅是村庄的减少,而更多地是村落空间、村落组织、村落关系、村落劳作模式以及村落文化系统全方位的变化,并整体表现为一种主动性的“文化应激”,即

^① 江帆、詹娜:《生态文明视域下民俗价值观的转换与重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